

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（十九）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

孔子庙堂碑

亦名“夫子庙堂碑”，武德九年刻，虞世南撰并书。原石刻成以后，不久即毁，宋人黄庭坚诗有“孔庙虞书贞观刻，千两黄金那购得”句，足见原石拓本传世之稀。目前已发现的原石精拓，仅为清人李宗瀚收藏过的一本，惜已流入日本。除此之外，传世本多为重刻、翻刻。其著名者有“陕西本”、“城武本”、“曲阜本”。

“陕西本”，因刻于陕西，故又称“西庙堂”。此碑曾于宋代重建，三十五行，行六十四字，碑末增刻“王彦超再建，安祚刻字”一行。碑石现存西安碑林。明嘉靖三十四年（公元1555年）因地震，石断为三。

“城武本”，因刻于山东城武县，故又称之为“东庙堂”，以区别于陕西的“西庙堂”。元朝至元年间（公元1335—1340年间）定陶河岸决口时出土。此本摹刻年代不详，据前代金石学家考证，摹刻时间当不晚于宋代。

“曲阜本”，为乾隆五十八年（公元1793年）翁方纲摹刻。在山东曲阜县学。另外，此碑还有其他版本传世，如“锦江书院本”（在江西），“海山仙馆本”（在广东）等等。

此碑为虞书唐碑中杰出之作，历代金石学家及书法家均评价很高，故又有“东观帖”之称，这点在检索时需加以注意。

馆藏为清乾嘉年间椎拓之“陕西本”，即“西庙堂”。椎拓

时碑已经磨洗，字画瘦细，有梁启超题签并跋。钤“双涛旧主”、“启超”、“任公”等印。

等慈寺碑

颜师古撰。碑文不记书人姓名，疑即师古自撰自书。亦不记载立碑年月。究竟何时立碑，虽历代金石学家都有考证，但其说法仍未统一。宋人赵明诚谓碑成于贞观二年，即公元628年。清人王昶却以为此碑当成于贞观三年，亦有谓碑成于贞观十一年，即公元637年以后者。

碑文楷书，三十二行，行六十五字。有额，篆书九字，石立今河南荥阳县。

碑文记述唐太宗李世民败王世充、窦建德后，在当时交战之地建寺为阵亡将士荐福之事。由于此碑内容反映了当时农民起义斗争的情况，史料价值较高。论其书法，杨守敬《平碑记》称赞此碑“结构全法魏人，而姿态横生，劲利异常，无一弱笔，直堪与欧、虞抗衡”。由于此碑剥泐较少，加之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，所以历代均以此碑作为研习书法的范本之一。

馆藏此碑整幅拓本，（长242厘米，宽115厘米）为十三行“此焉总获”之“焉”字未损，二十七行“时逢无妄”四字未损之乾嘉拓本。经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递藏，由丁惠康捐赠我馆。拓片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印。

房彦谦碑

刻于贞观五年（公元631年）三月二日。碑文为李百药撰，欧阳询隶书。石立于山东章丘县，其首题为“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铭并序”。故又称“唐徐州都督房彦谦碑”。碑文三面刻：阳三十六行，行七十八字；阴十五行，行十三字；撰书人姓名及年月皆题于一侧，共三行，前二行

行十二字，末行行九字。有额，篆书九字。

房彦谦，字孝冲。唐宰相房玄龄之父，仕隋为司隶刺史，出为泾阳令，仕唐为长葛令，后弃官不仕而清贫自守。后以子功追封定国公，其官位不显，而隋书为之立传二千余字，以其子玄龄为宰相之故。

书者欧阳询，传世之作以楷书为多而隶书甚少，此碑因系隶书而且完整，故为世人所重。其书法紧凑雄健，颇存六朝之风，可窥见欧书渊源。

馆藏最佳拓本为二十四行“十一月”之“一”字完好，三十三行“一变至道”之“一”字未损之明拓。碑文清晰可读，尾有龚景张，龚心钊等跋，并钤“夔臣审定”“龚新鉴赏章”“树镛审定”“龚新钊印”等章。

九成宫醴泉铭

刻于贞观六年（公元632年）四月。石立于陕西麟游县。魏征撰文，欧阳询楷书。三十四行，行五十字，有额，阳文篆书六字。

九成宫，即隋之仁寿宫，唐太宗李世民曾避暑于此，因乏水而掘地，得水而甘，遂谓之醴泉。

此碑书法极为深厚有力，气韵生动，为千余年来楷书中登峰造极之作，对后世影响极大，世人学书法习欧书者，莫不以此碑为范。此碑因历代椎拓过多，故磨损严重。自有宋以来，曾经多次磨洗、开凿，因而拓出的字体时肥时瘦。清以后之拓本，字划瘦细，已不存原碑风貌。

碑两侧亦有刻字，左为宋元丰年间（公元1076—1085年）诸家题名，右为宋绍圣年间（公元1094—1098年）、明正德年间（公元1506—1521年）及嘉靖年间（公元1522—1566年）诸家题名。

此碑因于唐时甚少椎拓，故传世最早拓本，乃为北宋初期拓。其本于抗战期间发现，系李琪与高士奇递藏本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其他声称为宋拓者，多为北宋末年或南宋拓本。

馆藏此碑最佳拓本，为北宋拓，有硬伤。（共13开，中一开为跋），为五行“重译来”之“重”字未损本。有竹西江恂题签，曰：“宋拓醴泉铭”，并钤“蔗畦”印。尾有江恂、梁讷题跋，钤“梁闻山考藏印”“杨绍和审定”等章。

馆藏中亦有赵烈文题跋之明拓“焉”字未损本；龚心钊旧藏，赵烈文，宗源瀚等题跋之乾隆拓“保”字未损本；乾隆秦臻翻刻初拓，龚心钊题签，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递藏之道光拓本等。

温彦博碑

全称《虞恭公温彦博碑》，镌于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，岑文本撰，欧阳询楷书。石在陕西礼泉，乃昭陵陪葬墓碑之一。碑文三十六行，行七十七字，总计二千八百余字。现在，原石虽存，但下半剥泐漫灭，碑文已不可通读。

此碑为欧阳询晚年之作，书法纯熟，婉和平正。其字结体较“九成宫醴泉铭”稍有收拢，亦不似《皇甫诞碑》寒险峻拔，历来书家以为此碑乃欧书典型之作。惟原石损泐太甚，无全文拓本传世。世传最古之本仅八百余字，不及全文三分之一，诚可惜也。

馆藏最佳拓本，为五行“准的行成廊”五字均完好无损之宋拓本。首叶不存，文中所缺八页，用士礼居、试砚斋二宋本影补。尾王世懋、顾莼题跋，钤“藻儒鉴藏”“毕泂润飞藏印”“王氏敬美”“南雅”“功甫纯观”等印十一方。

姜行本纪功碑

镌于贞观十四年（公元640年）闰六月二十五日。石立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。碑文楷书十八行，行四十七字。有额，题：“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纪文。”碑文末行有“参军河南司马太贞”字样，疑即撰书人之姓名。

据唐史，姜行本为贞观之将作大匠，曾总领修建九成、洛阳二宫之役。贞观十七年从太宗征高丽，中流矢卒。太宗以诗悼之，赠大将军，郕国公，谥曰襄，陪葬昭陵。

此碑乃唐伐高昌之时，行本任行军副总管，率众先出伊州，距柳谷百余里时，依山修造攻城之器具。行本见其处有《班超纪功碑》，因仿而效之，即令磨去班超之碑文，改刻己之营造攻具之功绩。此举虽给后世留下一研究初唐之资料，但行本所磨之班超纪功碑，自此再无一字留存，亦可见其鲁莽。

此碑书法虽佳，但剥泐太甚。馆藏最佳拓本为整幅本，系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等递藏本。（长198厘米，宽58厘米，侧宽13厘米，额长23厘米、宽17厘米。）第十七行“贞观”之“观”字右上角稍损，为清初拓本。侧有牛进达等题名。钤“顾千里印”“顾氏所收石墨”章。

（执笔人：王丽燕 杜伟生）

